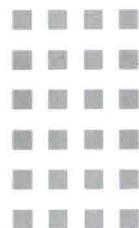




杨艳春 方章东 ◇ 编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ZHONGGUO TESE SHEHUI ZHUYI LILUN YU SHIJIAN YANJIU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圖書(103)日暮窮途各
文、政治、哲學、軍事、經濟、社會文化、自然科學等
TE-8102-11
8-901-1383-1-878 14821

研究問題・學生論述題・論文題目選定表
卷(2008)第(8102)年問題題目之選定表
工程管理研究全集普通工程項目・半導體製造業・水道供

楊艳春 方章东 ◇ 编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ZHONGGUO TESE SHISHU ZHISU LIJUN YU SHIJIAN YANJIU

(2008) 版權 著作權與版權所有者聲明

本院開設的每一門科目，本院均為授課學院。但該科目的主教

師

由該系主任或該系老師主教。各科目的主教老師請參見各科目的說明。

本

各科目的說明請參見各科目的說明。各科目的說明請參見各科目的說明。

本

各科目的說明請參見各科目的說明。各科目的說明請參見各科目的說明。

本

各科目的說明請參見各科目的說明。各科目的說明請參見各科目的說明。

本

主編：甘利輝
副主編：韓繼太

書名：韓繼太
副主編：韓繼太
副主編：韓繼太

總主编：韓繼太
副主编：韓繼太

出版

出版基木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杨艳春,方章东编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5664-1692-6

I. ①中… II. ①杨… ②方…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78993 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杨艳春 方章东 编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240mm
印 张: 12.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ISBN 978-7-5664-1692-6

策划编辑: 姜萍
责任编辑: 姜萍
责任印制: 陈如

装帧设计: 李军
美术编辑: 李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65106311

本书是以下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排名不分先后):

南昌工程学院研究生教育质量工程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专题研究

南昌大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招标项目:价值观教育的人学理论研究

江西省教育厅研究生教改项目:以四大平台建设提升研究生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研究

江西省教育厅研究生教改项目: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生态性研究

闽江学院闽都学者专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理路研究

南昌工程学院教改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思政课教育教学研究

安徽农业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016yjsjpk001)

目 录

专题一 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哲学反思

一、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革命主题与建设主题	2
二、准确把握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设想同现实的反差	4
三、深化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6

专题二 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当代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	12
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	17
三、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当代价值	22

专题三 增强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价值引领应加强方法论教育

一、加强方法论教育是增强马克思主义战斗力和说服力的内在要求	27
二、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才能促进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	30
三、马克思主义对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32
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科学研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38

专题四 毛泽东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

一、毛泽东在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46
二、毛泽东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55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的曲折前进	60

专题五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矛盾辩证法

一、重新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吹响改革开放的新号角	67
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历史性课题	69
三、初步形成了系统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73
四、把握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矛盾辩证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	77





专题六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丰富与发展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战略	87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与 发展	93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提升	99

专题七 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照

一、科学发展观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发展观，体现实践与认识的 辩证法	110
二、科学发展观是全面、系统的发展观，丰富了唯物辩证法的系统性、整 体性思想	112
三、科学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观，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辩证 统一	114
四、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充实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 发展思想	115
五、科学发展观是关于社会和谐发展的观点，继承和发展了唯物 史观	116

专题八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120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的发展目标和 发展战略	123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	126
四、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127
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133

专题九 党的群众路线和思想路线的互动品质 篇章目录

一、关于党的群众路线	136
二、关于党的思想路线	140
三、党的群众路线与思想路线的辩证法	143

专题十 坚持“三严三实”，培育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一、“三严三实”是树立党员意识，培育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基本要求	148
二、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理应成为党员干部的社会理想	151
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154

专题十一 价值观教育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路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应该以马克思人的本质观为基本理论依据	160
二、以马克思人的本质观为指导，加强和改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162

专题十二 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哲学底蕴， 提升“两学一做”自觉性和实效性

一、深刻领会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蕴	169
二、深入学习运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贯穿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	174
主要参考文献	189
后记	191

专题一

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哲学反思

【导读】社会主义的三次飞跃，特别是20世纪的曲折发展告诉我们，影响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一是怎样认识社会主义？二是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三是怎样搞好执政的共产党的建设？这三方面因素实质上是三位一体的，其中，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实践目标，党的建设是关键，不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就谈不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为此，本章着力从科学认识社会主义革命主题与建设主题，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设想同现实的反差，深化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等方面作出分析。

世界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三次历史性飞跃，特别是20世纪的曲折发展，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社会主义运动的成败得失。可以说社会主义运动理论与实践的摸索是20世纪世界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之际，我们更应该从哲学高度反思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100年的建设经验，认真总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

教训,深化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觉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分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和发展规律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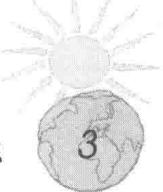
总结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经验表明:影响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一是怎样认识社会主义?二是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三是怎样搞好执政的共产党的建设?这三方面因素实质上是三位一体的,其中,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实践目标,党的建设是关键,不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就谈不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和苏东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革命主题与建设主题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不仅有实践背景因素,也存在理论层面的争论。应该说,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领袖们已经创立了占主导地位的、较为系统、成熟务实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这是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过去关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建设理论还是零散的、不太成熟的,甚至有许多理想化的设想成分。再加上目前新形势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发生着深刻变革,这样,在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后,如何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巩固社会主义运动成果,就是共产党执政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共产党执政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原则和方法,而不局限于其具体的理论观点,我们不能教条式地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分析革命问题得出的理论观点无原则地应用于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现代化建设。相反,只有把握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髓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区分社会主义革命主题和建设主题,主题转换应以无产阶级是否夺取政权取得革命胜利为依据。这是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

马克思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可以用来指导革命,也可以用来指导建设,但这种指导主要是方法论的指导。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看,由于时代使命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侧重于革命,但也包含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列宁后的社会主义,则主要侧重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但由于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难题,因而没有解决如何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指导作用。过去,在如何夺取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方面,我们主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主要武器是唯物史观,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理论,采取的主要方法是阶级斗争;现在,则主要是通过改革、开放的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为了搞好建设,我们就不应把侧重点放在阶级斗争上。因此,今天要着重研究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建设主题,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建设功能,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在当下中国,我们要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明确党的历史使命,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实践路径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和解决资本主义主要矛盾时,系统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和社会有机体思想,主张无产阶级革命主要应通过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超越资本主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把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方法泛化、绝对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将阶级斗争扩大化,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唯物史观的社会基本矛盾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有指导意义,我们不能因此忽视其本身包含着的建设主题;相反,我们对于唯物史观、社会基本矛盾,应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来深入研究。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也是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物质保证,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地大力发展生产力。过去,我们在这方面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是急于求成,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结果犯了“大跃进”式的严重错误;另一方面是过分强调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作用,通过“抓革命、促生产”的方式来发展生产力,结果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导致“文化大革命”,导致批判唯生产力论,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些都是违背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反思这些深刻教训,我们更应该树立按经济规律办事、按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办事的思想,全面、系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两学一做”,一心

一意搞建设,促进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准确把握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设想同现实的反差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革命主题与建设主题,还必须认清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运动基本特征的理论及其与现实的反差,坚持从实际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反对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设想与现实社会主义混同,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这是我们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

社会主义特征是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的显著特点和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重要标志,是对社会主义本质不同侧面的体现。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揭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作为一个严谨的社会科学家,马克思不但不愿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具体阐述,而且认为未来社会主义的人们在这点上比我们更聪明;只是针对一些人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曲解给予批判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提出了关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的主要设想,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1)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剥削制度;(2)实行按劳分配原则;(3)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4)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5)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业等。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设想同现实社会主义存在巨大的反差:首先,二者赖以建立的物质基础不同。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充分发展为前提,而现实社会主义都是从农业经济过渡而来的。其次,革命起点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前,设想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是发达资本主义,其公式是:法国人开始,德国人继续,英国人完成。而现实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是资本主义较不发达的、曾是“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俄国,甚至曾是资本主义更不发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这两个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其内部的一些处于封建农奴制、奴隶占有制,甚至原始公社制的少数民族地区是在党和国家的大力帮助下,跨越其他社会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行列的。再次,历史时期不



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已走向衰亡的条件下建立的,而现实社会主义大多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半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建立起来的,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不是已经走向衰亡,而是根本就没有获得较充分的发展,这恰恰成为它们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障碍。最后,外部环境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社会主义的建立是通过世界性革命,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建立;而现实社会主义往往在较为贫穷、落后的国家先建立。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处于由盛而衰的时期,社会主义发展的外部环境极其恶劣。

厘清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同现实的反差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观,防止在认识和实践中把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设想与现实社会主义混同,防止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与社会主义本质混同,防止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混同。十月革命胜利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能够成功;相反,什么时候我们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要遭受重大挫折甚至失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可以说是教条主义得的病,官僚主义送的命,外部和平演变催的命。其次,有助于我们从本国实际出发,认清本国的社会发展阶段,并根据此来确立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既要防止急于求成的极“左”行为,又要防止在社会主义建设受到挫折时,悲观失望、丧失社会主义信念,甚至像苏联东欧共产党那样最终放弃社会主义。再次,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国际关系,寻找战胜资本主义的新思路,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自信心。现实社会主义是在较为贫穷落后的国家首先建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处于“盛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和斗争将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环境恶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和竞争,过去是通过战争和意识形态强化起主要作用;而在和平、发展与合作成为主题的时代,只有在和平竞争中谁取胜谁就能更好体现优越性。因此,和平发展与和平演变是长期存在的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这就要求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和平共处与反对和平演变中,认真分析和解决国内、国际问题,在执政过程中不犯路线、方针、政策上的重大错误,抓住机遇,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在与资本主义的和平竞争中争取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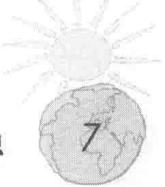
动权。苏东剧变、华盛顿共识破产、北京共识逐渐形成都从不同视角证明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最后,有助于我们把远大理想与现实目标有机结合起来,既要有战胜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胜信念,更要脚踏实地地建设社会主义。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三、深化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厘清社会主义革命主题与建设主题、社会主义的理论设想与现实反差的辩证关系,中国共产党就应该根据时代要求和实践主题的转换,深化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为此就要正确认识和区分领导党与执政党的辩证关系,正确定位党的身份和进行党的角色转换,科学把握党的历史方位,在完成新的历史使命中,根据领导党与执政党的不同要求,有针对性地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科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一,正确认识和区分领导党与执政党的必要性。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二者不可分割。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的一个重大差别,苏联、东欧共产党正是因党的领导地位被削弱而最终丧失了执政合法性,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正因如此,我们强调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要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

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尽管这与苏联的政党制度存在一定差别,但也容易产生一党执政的弊端和不足,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首先就是要在党内健全分权、制约机制,认清中国共产党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的双重身份,只有不断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才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认识和把握这一特点十分重要,我们既要看到二者的统一性,又要看到它们的区别,中国共产党自身存在的双重身份,处理得好,将大大有助于改善党的领导和提高执政水平;处理得不好,则可能削弱党的领导,形成党政不分、失去对党的监督等弊端,甚至可能危及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应该引起高度



重视。

第二,作为领导党与作为执政党有不同的特点。中国共产党不是自它诞生之日起就具有这“双重”身份,而是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是作为这一革命的领导者,通过其正确的路线与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发挥其指引作用,但那时党并未在全国范围内执政。也就是说,它只是革命的领导党而非执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同时又是领导全国人民群众、领导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一身二任。虽是一身二任,但只有认清“二任”在权力的性质、来源、范围上有所不同,才能克服党政不分的弊端。

首先是领导权与执政权的权能不同。党的领导权是一种政治权威,而非国家权力。其特点是进行政治上、思想上的指导,可以进行方针政策的指导与号召,以其政治权威使人信从,但不能以党的强制力直接指挥、命令政府机关与全体人民服从党的决定。执政权则是一种国家权力,其特点是具有国家强制力,权力相对方一般必须遵从。当然,国家机关的党组与党委,也不能直接行使国家权力,而只能通过“执政者”去做。

其次是领导权与执政权的来源不同。党的领导权威,主要是靠它所倡导的政治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吸引力,它的治国纲领、路线、政策所正确体现的人民意志与利益的政治引导力,它的组织与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为人民利益牺牲奋斗的精神感召力,而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戴,并为宪法所确认。这是其领导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根据。作为执政的党组织与党员干部,他们所掌握与行使的国家权力是由人民经过法定程序所授予,即通过人民的直接或间接选举,当选后才能“执政”,才取得组成政府、行使权力的合法资格。其执政权的合法性是要经过法定程序确认后才具有的。

最后是领导权与执政权的范围不同。作为执政党,其“执政”的权力范围,主要限于政权工作,通过人大与政府工作,包括行政、司法、军事工作等。而领导党则不仅限于在政治上领导政权与政府工作,而且领导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企事业单位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其中还包括领导全党全国人民群众去监督政府。因此,其领导权威影响所及范围,包括国家政治活动与全部社会生活,要比作为执政党的权力范围宽广得多。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重要特点,后者主要是

限于争夺政治权力,限于“执政”,其政党活动也带有季节性而非常态性,即只着重在竞选时期。它不“领导一切”,对社会一般也不起领导作用;它们经常联系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并反映其意志与利益的是一些社会“利益集团”或“压力集团”,如企业家集团、工会、人权组织等类组织。

第三,作为领导党与作为执政党所起的作用不同。厘清中国共产党这双重身份的区别,就可以进一步把握这不同身份在法治国家中的不同地位与作用,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改进执政方式,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首先,“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不同。领导党在法治国家中的领导作用,主要是实行“以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即将自己的政治主张,通过法定程序,通过人民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为法律,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来授予并制约政府的权力。执政党(执政的党组织与党员干部)要保证作为领导党的“以法治国”方略的实现,即通过党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党组与党员,将党的主张依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制定为法律。同时,执政的党组织与党员干部,主要是实行“依法治国”,即支持与保证政府依法行政、依法司法以及依法治军等,执政的党组织与党员干部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并起表率作用。

其次,政治领导与政治权力不同。领导党的领导主要是对国家事务进行思想政治上的总的领导,即制定治国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不去具体干预与包办政府的工作。执政的党组织与党员干部则主要是运用国家授予政府的政治权力去“执政”,具体保证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实现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

再次,监督与被监督不同。执政党不但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而且要接受领导党的监督。领导党不但要通过党的系统去监督执政的党组织与党员干部,而且要自觉领导全体人民群众特别是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去监督执政的党组织与党员干部。1957年,党中央曾经提出过建立“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制”,其目的也在于此。这样由党领导人民群众来监督执政党,是党内外监督的有机结合,这样也才能加强党的监督与人民群众监督的力度和效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领导党同人民一道,主要是监督的主体;执政党则主要是监督的客体或对象。当然,领导党也要进行自我监督和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作为执政的党组织与党员干部也要监督其所属的有关党组织、



党员和国家机关、其他非党官员。

最后,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条件下又有差别。

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与作为执政党区分的一个最明显特例,是体现于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领导方略。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党在全国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但单就香港特别行政区而言,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提出“一国两制”的方针;通过领导政府同英国谈判发表《中英联合声明》,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通过政府颁布各项政策,支持和保证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则完全由港人选出的本地人士组成,该政府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香港的法律治理香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不加干预。这样,党在全国是领导党,而在香港却不直接去执政(除有关外交与国防事务外),那里不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干部组成政府执政,而是由港人执政、港人治港。在澳门特别行政区也是如此,将来大陆与台湾实现和平统一后,也将在台湾实行相同原则。

当然,上面所列的领导党与执政党的区别,只是相对而言,不可绝对分开。就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必须坚持党的统一性,坚持在全国范围内党的领导与党执政的一致性。这表现在:党的政治领导是党执政的实质内容与依靠,党执政则是实现党的领导的一种主要途径。就全国而言,党一身二任,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如果只看到或强调这一主要方面,而忽略或不重视它们在权能、地位和作用上有相区别的一面,就容易导致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导致党内行政化倾向,包办代替政府的工作,而忽略甚至忘记作为领导党的更广泛、更重要的使命与职责,造成“党不管党”;导致人们将执政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错误,都归于整个共产党领导的错误;导致党不能以领导者身份,处于比执政党更高、更客观、超脱的地位,去监督执政的党组织与党员干部,而把他们的错误只当成“党内问题”,以党的得失、同志的情面去姑息犯错误或违法犯罪的“执政”的党员干部,以“家法”(党纪)代国法。这是导致长期党政不分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之,领导党如果没有这种全面的领导意识,而放弃领导与监督的职责,只要执政者腐败无能,就